

〔清〕

顧炎武

著  
顧諱天之明命

桀紂帥天下以暴

〔清〕

黃汝成

集釋  
財者未也

未上有上好仁而不好義

樂保群

呂宗力

校点  
者也

君子而時中

日

知錄集釋

肫肫其仁

卷之七

孝弟爲仁之本

察其所安

子張問十世

媚輿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武亦盡善

朝聞道夕死可矣

# 日知錄集釋

〔清〕顧炎武

著

〔清〕

黃汝成

集釋

栾保群

呂宗力

校点

花山文艺出版社  
一九九〇年·石家庄

书名题字：张政烺

责任编辑：宁宣成

装帧设计：宋丕胜

## 日知录集释

〔清〕顾炎武 著 〔清〕黄汝成 集释

桑保群 吕宗力 校点

---

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---

850×1168 毫米 1/32 51.625印张 1.263千字 1990年8月第1版  
1990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：1—1,000 定价：（精）40.00元

ISBN 7-80505-237-9/Z·2

（全两册）

## 出版说明

清初大思想家、大学者顾炎武，震惊于明清之际天崩地坼的社会大变动，怀着一腔亡国亡天下的悲痛和愤懑，殚三十年之力，成终生之志，力矫明末空疏浮华的学风，对经义、政事、世风、礼制、科举、艺文、古事、史法、天文、舆地等几乎是当时人文科学的全部学科，都进行了深湛的研究，穷源竟委，融会贯通，明体达用，撰成一代巨著《日知录》。此书在中国思想史、学术史上的辉煌地位，海内外学者久有定评，兹不赘言。现仅就其版本源流和我们的整理工作略作说明如下。

顾炎武生前曾因友人多求抄写，患不能给，遂于康熙九年（1670年）先刻《日知录》八卷（后附《读史十事》）行世。世称符山堂初刻本。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顾炎武去世，其弟子潘耒从其家求得《日知录》全部手稿，经再三校勘，于康熙三十四年（1695年）刻于闽中，是为遂初堂刻本。此本计三十二卷，文字多于八卷本约五倍。但由于潘耒愆于当时文字之祸，不得不对原稿中大量“违碍”之处进行删改，“所刊落者有全章，有全节，有数行，自余删句换字，不可遽数”（详见黄侃《日知录校记序》）。潘耒是顾炎武入室弟子，自己删总比让官府删要好得多，所以潘氏的功劳仍不可没。所幸当时还有手抄本暗自流传于世，给后人恢复原书本来面目提供了机会。

至乾隆六十年（1795年）又有据遂初堂重刊本，末附《日知录之余》二卷。另外还有乾隆时巾箱本、皇清经解本，这些在版本上

都没什么重要价值。

及至道光年间，青年学者黄汝成以遂初堂本为底本，参以阎若璩、沈彤、钱大昕、杨宁四家校本，成《日知录集释》三十二卷。复得《日知录》“原写本”，并参以陈讷（宋斋陈氏）、张惟赤（南曲张氏）、蘧园孙氏（名佚）、楷庵杨氏（名佚）等校语，成《日知录刊误》二卷。后又得陆筠（龟尊陆氏）校本，作《续刊误》二卷。这样，虽然黄汝成也不敢用“原写本”中的违碍文字补改潘氏遂初堂本，但毫无疑问，他的《集释》和《刊误》给世人提供了《日知录》的最精善之本。至于黄氏在《集释》中收录了道光以前九十余位学者对《日知录》的研究成果，更使他稳坐潘耒之后顾氏功臣的第二把交椅。

黄氏之后，致力于《日知录》一书者，有清李遇孙、丁晏、俞樾诸家。李遇孙的《日知录续补正》是编次阎若璩《日知录补正》之余，又参以己见及诸家之说，计三卷。丁晏的《日知录校正》则辑吴玉搢之评及阎若璩《补正》，又附以丁晏之子丁寿昌评校所成，其中阎氏《补正》多已为《集释》所收录，未免余赘。而俞樾《日知录小笺》多出自家读书所记，以补顾氏未及，篇幅不大，却翔实可喜。以上三种均属辨正发明之作，我们分别标以“续补正”、“校正”、“小笺”之目，摘其精要，插入《日知录集释》各条之后，以供读者参阅。

黄侃的《日知录校记》一卷，使本书在《集释》之后在版本上得到了一个突破。潘耒惧于文字狱，不得不删改原文，黄汝成虽然得到了原写本，也无法据以恢复本来面目，这样，《日知录》的原作思想必然受到极大损害。黄侃在民国间从张继手里得到雍正间《日知录》抄本，据以对校《集释》，补正数百处，近万字，恢复了湮没二百余年的《日知录》本来面目，不能说不是一件大快事。我们为读者方便，也把它插录入《集释》各条之下，但避免烦琐，对那些避明朝国讳的校语全部删去（如明光宗朱常洛，

抄本于“洛”下注“讳阙”二字)。

此外，黄汝成的《刊误》、《续刊误》，我们也循照此例，分别录入各条之下，但一些太琐碎迂腐的校语，如对“于於”、“谄谄”之类误刻的分辨，我们也大都删去。

顾炎武《日知录之余》、《读觚十事》两种，我们仍作附录。以供读者研究。

《日知录集释》以道光十四年嘉定黄氏西谿草庐重刊本为最善，我们即据以点校。但其中间有舛讹，我们均据引文原出处纠正，用方括号〔 〕标出正字。零星校语也用方括号作标志。

《日知录》一书博大精深，而点校者自揣谫陋，难胜此任，虽勉力为之，错讹必多，还望通人学者不吝指正，甚谢！师兄陈祖武同志特赐《从日知录到日知录集释》以作前言，一并感谢。

栾保群 吕宗力  
一九八九年四月

# 从《日知录》到《日知录集释》

陈祖武

《日知录》是清初著名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的代表作品，也是十七世纪中叶我国知识界的一部足以反映时代风貌的学术巨著。它不仅在当时激起了强烈共鸣，而且影响所及，绵亘有清一代。道光初，黄汝成集诸家研究之大成，纂为《日知录集释》，把对本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。三百年过去，《日知录》及其《集释》依然为学术界所重视。为了有助于读者阅读和利用本书，我们把《日知录》及其《集释》的有关情况做一个概略的介绍。

## (一)

《日知录》的著者顾炎武，江苏昆山人，生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，卒于清康熙二十一年（1682年）。原名绛，字忠清，明亡，改名炎武，字宁人，号亭林，又署蒋山佣，学者尊为亭林先生。

顾炎武出身于江东望族，其高、曾祖父世为明廷仕宦。至其父辈，家道中落。时值明末，经济崩溃，政治腐朽，朱氏王朝犹如积年痼疽，只待溃烂，社会的危机，家境的窘迫，逐渐孕发顾炎武

为学以救世的思想。虽然他愤世疾俗，十四岁取得诸生(即秀才)资格)后，即加入了当时江南进步文化人的组织——复社，但是却未能摆脱科举制度的桎梏，迄于二十七岁，科场角逐的蹉跎，耗去了他十三个宝贵的春秋。明崇祯十二年(1639年)，他为取得举人资格而再度搏击，结果依然名落孙山。此时，明末农民起义如火如荼，明清战事日益加剧，明王朝已经灭亡在即。严峻的社会现实把顾炎武从科场沉浮中震醒，于是他“感四国之多虞，耻经生之寡术”(顾炎武：《亭林文集》卷六《天下郡国利病书序》)，断然挣脱了科举制度的束缚。

顾炎武家中收藏有很多图书，不仅有我国历代的重要史籍、明历朝实录、地方志，而且还有大量的文集、笔记。从九岁起，他便不间断地阅读了《史记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、《战国策》、《资治通鉴》等史学名著和《孙子》、《吴子》等兵家著作，打下了坚实的学问基础。离开科场之后，他日以继夜地从历史文献中去搜集有关农业、水利、赋税、矿产、交通等方面的材料，打算编成一部篇幅很大的书，以便寻找造成明末社会积弊的根源，探求挽救社会危机的途径。这部书虽然因为天下大乱没有能够最终完成，但是基本材料都完整地保存下来了。后来，他将这些材料一分为二，其中有关经济问题的资料汇编为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，有关历史地理的资料则汇编为《肇域志》。这两部资料长编，内容丰富，史料翔实，直到今天，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尤其是明代的经济史和历史地理学，都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

明崇祯十七年(1644年)三月，朱明王朝为农民起义军推翻。五月，清军进入北京，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清朝。同时，江南的明朝官员则拥立福王朱由松，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廷，历史上称之为南明。经昆山令杨永言举荐，弘光政权授顾炎武以兵部司务之职。翌年春，为了准备到南京任职，他把先前的著述工作停了下来，集中精力撰写了《军制论》。



《形势论》、《田功论》、《钱法论》等文章。然而未及赴任，腐败的弘光政权已告灭亡。目睹清军的野蛮屠戮，顾炎武愤然投笔从戎，在苏州参加了抗清斗争。兵败，避居常熟乡间。随后，福州南明隆武政权再授兵部职方司主事之职，又因交通阻隔，不能到职。

这以后的十余年间，顾炎武一直流亡在大江南北，从事秘密反清活动。连年的出入风险，流转异乡，使他艰苦备尝，且见南明政权大势已去，于是渐起以游为隐之念。清顺治十二年（1655年）五月，昆山豪绅叶方恒为并吞顾氏家产，怂恿顾家旧仆陆思以告发顾炎武反清活动相要挟。顾炎武闻讯，匆匆潜回昆山，处死陆思。叶方恒借机发难，勾结官府，必欲置之于死地。后幸得当地友人多方营救，始得脱身。陆思之狱，直接促成了他的弃家北游。

顺治十四年秋，顾炎武将家产尽行变卖，只身离乡北上，游历山东、河北、北京，时年四十五岁。自康熙元年（1662年）起，他更将游踪扩至河南、山西、陕西，行万里路，读万卷书，决计把自己的后半生贡献给著述事业。此后，因文字狱的牵连，他曾于康熙七年在山东济南冤囚圜圉达半年之久。康熙十七年，清廷议修《明史》，特开博学鸿儒科以笼络海内名儒。为表示至死不与清廷合作，顾炎武以迫近古稀之年，携嗣子衍生远离京城，卜居于陕西华阴。此时，其外甥徐乾学、秉义、元文兄弟业已贵显，屡屡致书邀其南归，皆为他所回绝。康熙二十年八月，顾炎武自华阴至曲沃，不幸一病不起。翌年一月九日，溘然长逝，享年七十岁。

顾炎武是清代学术史上一个继往开来的学术大师，也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卓越的思想家。他一生广泛涉足于经学、史学、金石考古、文字音韵、方志地理以及诗文等，辛勤开拓，锲而不舍，留下了许多宝贵著述。其中最有价值的是《日知录》、《音学五书》、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、《肇域志》和《顾亭林诗文集》等。他严谨健实的学风，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，繁富的学术成就，在清

代学术史上产生了久远的影响。后来的学者，沿着他所开启的路径走下去，或是继承其朴实归纳的治学方法，或是发扬其经世致用的治学精神，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。因此，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评顾炎武为“清学开山”，就不是没有道理的。

## (二)

《日知录》是顾炎武萃毕生心力精心结撰的作品，用他的话说，就叫做“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”（《与友人论门人书》）。什么是他的志？顾炎武在写给他的学生潘耒的一封信中，曾就此做过阐释，他说：“君子之为学也，非利己而已也，有明道淑人之心，有拨乱反正之事，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，则思起而有以救之。……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”（《与潘次耕札》）。用一句话来表述，他在这里所说的志，就是要通过其学术活动来“明道救世”。那么，顾炎武的业又是什么？其实，业之与志，二而一，一而二，水乳交融，不可分割。正如他在逝世前夕论及毕生追求时所说：“天生豪杰，必有所任。……今日者，拯斯人于涂炭，为万世开太平，此吾辈之任也。仁为己任，死而后已”（《病起与蓟门当事书》）。

在《论语·子张篇》中，孔子的弟子子夏论及治学，曾谈过如下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日知其所亡，月无忘其所能，可谓好学也已矣。”顾炎武即取子夏论学语义，题书名为《日知录》，以示好学的笃。至于《日知录》的确切始撰年代，今天已难详考。不过，一个大致的时期则是可以定下来的。康熙九年，当本书以初成八卷在江苏淮安付刻时，顾炎武曾在卷首写有简短识语，据称：“愚自少读书，有所得辄记之，其有不合，时复改定。或古人先我而有者，则遂削之。积三十余年，乃成一编。”由康熙九年上溯三十余年，恰好是明崇祯十二年顾炎武离开科场之后。可见，《日知录》

的始撰大致就在此时。

初刻八卷本问世之后，顾炎武并不以之为满足，又在尔后的为学实践中，不断加以完善充实。先是扩至二十卷，随后又成三十卷、三十余卷，直到逝世前夕，依然呕心沥血，辛勤耕耘。他在写给潘耒的信中讲得很清楚：“《日知录》再待十年，如不及年，则以临终绝笔为定。”后来，潘耒承其遗志，将书稿稍事整理，于康熙三十四年，以三十二卷在福建建阳刊刻。至此，《日知录》始成完书。

《日知录》涵盖古今，内容宏富。但其具体门类，则执说不一。潘耒曾大体归为八类，即经义、史学、官方、吏治、财赋、典礼、舆地、艺文。乾隆间修《四库全书》，分得更细，竟达十五类之多，即经义、政事、世风、礼制、科举、艺文、名义、古事真妄、史法、注书、杂事、兵及外国事、天象术数、地理、杂考证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以为还是按照著者自己的分类为好。顾炎武曾把全书分为三篇，即：“上篇经术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闻”。关于本书内容的归类，实际上并不是一个技术问题，它所反映的是对著者创作意图的理解问题。潘耒是著者的入室弟子，颇得其师为学要领，所以他说：“先生非一世之人，此书非一世之书也。魏司马朗复井田之议，至易代而后行；元虞集京东水利之策，至异世而见用。立言不为一时，录中固已言之矣。异日有整顿民物之责者，读是书而憬然觉悟，采用其说，见诸施行，于世道人心实非小补。如第以考据之精详，文辞之博辨，叹服而称述焉，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”（《遂初堂集》卷六，《日知录序》）。而《四库全书》的编纂者，为狭隘的考据学障蔽视野，只看到《日知录》中考证经史的内容，便夸大为全书精粹所在，并进而诋斥潘耒为“殆非笃论”（《四库总目提要》），就未免遗其大而拾其小，难怪晚清学者朱一新要讥之以“买椟还珠”了（《无邪堂答问》卷五）。

顾炎武为什么要写《日知录》？他在《初刻日知录自序》中说得

很直率，那便是要“明学术，正人心，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”。此后，他与友人的书札往复又多次重申，指出：“向者《日知录》之刻，谬承许可，比来学业稍进，亦多刊改。意在拨乱涤污，法古用夏，启多闻于来学，待一治于后王”（《亭林文集》卷六，《与杨雪臣》）。这样的撰述宗旨，始终如一，老而弥坚。当他晚年向友人谈及一生的学术道路时，曾经说过：“君子之为学，以明道也，以救世也，徒以诗文而已，所谓雕虫篆刻，亦何益哉！某自五十以后，笃志经史，其于音学深有所得，今为《五书》以续《三百篇》以来久绝之传。而别著《日知录》，上篇经术，中篇治道，下篇博闻，共三十余卷。有王者起，将以见诸行事，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”（《与人书二十五》）。足见《日知录》的撰写，正是顾炎武毕生追求的集中反映，就是要“明道救世”。因此，书中无论谈“经术”也好，谈“博闻”也好，归宿皆在“治道”。《日知录》实际上是一部以古为今用为指导思想，探讨治国平天下道理的著作。乾嘉考据学家视之为考据札记，显然贬低了这部著述的历史价值，也歪曲了著者的撰述意图，当然是不可取的。

### （三）

明清之际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。明末社会经济的崩溃，政治的黑暗腐朽，以及作为其在文化思想领域反映的心学泛滥、学风空疏；接着又是明清封建王朝的更迭，清初的大规模军事对抗和民族高压，天翻地覆，历时六十余年。大动荡的社会现实，向那个时代的学者、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尖锐的问题。这些问题有经济的，有政治的，有军事的，也有文化思想的。譬如怎样去抑制土地的兼并，怎样去合理地分担赋役，怎样去更易国家的政治制度、官吏制度、军事制度、教育制度，怎样去

扭转空疏学风等等。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，以历史和现实的结合，展示了著者对上述问题的深刻思考。

土地兼并，赋役不均，这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痼疾，也是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经济根源。顾炎武在迈入社会门槛之初，即对此予以高度重视，在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中作了集中反映。由《天下郡国利病书》到晚年精心结撰的《日知录》，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益趋深化，终于写成《苏松二府田赋之重》一类极富说明力的篇章，为研究明清之际的江南经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。

《日知录》从探讨经济问题入手，进而引向对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的批判，体现了若干有价值的民主思想。这首先就是对君权的怀疑。顾炎武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，大胆地纳入自己的论究对象。在该书卷二十四《君》条中，他广泛征引历代载籍，以论证“君”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，不惟天子可称君，就是人臣、诸侯、卿大夫，乃至府主、家主、父、舅等皆可称君，从而得出君在古代为“上下之通称”的结论。这样的论证，剥去了君的华贵外衣，简直近乎于在嘲弄君权了。而且，顾炎武并未就此却步，他进而提出了反对“独治”，实行“众治”的主张（《日知录》卷六，《爱百姓故刑罚中》），倡言“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”（同上书卷九，《守令》）。

《日知录》中民主思想的另一个反映，就是富有探讨价值的社会风俗论。顾炎武在这里所说的风俗，并不是狭义的风土人情，而是更广泛得多的社会风气。面对着数十年来社会风气的江河日下，贿赂公行，奢侈成风，他憧憬着世风的醇厚和国治民安。为此，他在书中用了几乎一卷的篇幅，详尽地考察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，以确凿的史实论证：“观袁、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，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，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”（同上书卷十三，《宋世风俗》）。在顾炎武看来，改善社会风气的有效途径，必须由国家最高统治集团做起，认真进行社会道德教育，在知识界培养

讲求廉耻的风尚，发挥社会舆论的监督作用，使之蔚成风气。他在书中引述宋人罗从彦（字仲素）的话说：“教化者，朝廷之先务；廉耻者，士人之美节；风俗者，天下之大事。朝廷有教化，则士人有廉耻；士人有廉耻，则天下有风俗”（《廉耻》）。他认为：“天下风俗最坏之地，清议尚存，犹足以维持一二。至于清议亡，而干戈至矣”（《清议》）。

学风问题，不仅关系到一时的学术文化水准，而且从长远来看，它还影响到国家和民族的兴衰。经历兴亡代谢，顾炎武在沉痛的历史反思中奋起，猛烈抨击脱离现实的空疏学风，进行了务实学风的积极倡导。对明末知识界的清谈之风，顾炎武深恶痛绝，他认为就学术予社会的影响而言，这种恶劣积习，正是酿成明末“神州荡覆，宗社丘墟”的症结所在。因此他反对“以明心见性之空言，代修己治人之实学”，痛斥理学家的空谈“性与天道”为“禅学异端”（同上书卷七，《夫子之言性与天道》）。在为学实践中，他把中国知识界传统的“博学于文”同社会现实所要求的“行己有耻”相结合，并以之作为治学的根本之道去加以提倡，从而使之成为清初知识界的一面旗帜。

作为顾炎武思想的结晶，《日知录》既反映了著者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列所发出的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呐喊，同时它又折射出历史的局限，使著者思想所不可避免地存在的若干糟粕。诸如浓厚的封建正统意识，腐朽的封建道德说教，狭隘的民族偏见以及迂阔的复古主张等等，所有这些都是应当予以批判的。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，发扬其民主性的精华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对《日知录》以及整个传统文化所应取的批判继承态度。

#### （四）

《日知录》以其朴实无华的务实风尚，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

终结，开启了一代健实的新学风。因此，它问世之后，在学术界迅速激起反响。一时南北学者，竞相作同调之鸣。但是自康熙中叶以后，随着清廷统治的趋于稳定，尤其是雍正、乾隆两朝文字狱的冤滥，顾炎武在《日知录》中所寄寓的学以经世的思想横遭阉割，为此后学术界所继承的，只是其朴实的考经证史方法而已。于是琐细的考证补苴，日渐成为《日知录》研究中的主流。此风自阎若璩开其端，中经李光地等朝中显贵张大其势而深入庙堂，到乾隆、嘉庆两朝达于极盛。百余年间，注者蜂起，至九十余家之多。其中既有经学大家如惠栋、江永、顾栋高、戴震、庄存与，也有史学大家如全祖望、钱大昕、王鸣盛、赵翼、邵晋涵，还有一时文坛盟主方苞、姚鼐等。风起云涌，久传不衰，俨若专门学问。

嘉庆、道光之际，清王朝越过其鼎盛时期而步入衰世。绵延于川、楚、陕边区广袤原野的白莲教大起义，直逼官禁的北方天理教起义，西方殖民者以武力为后盾的肮脏鸦片贸易，凡此种种，内外交困，有力地摇撼着清王朝的统治大厦。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动荡时期已经来临。当此多事之秋，知识界反映最为敏锐。面对深刻的社会危机，乾嘉以来风靡朝野的考据学，伴随其所附着的社会亦盛极而衰。以庄存与、刘逢禄等为代表的常州今文经学派，阐发《春秋》公羊学大义，倡变法以图强。道光五年（1825年），著名思想家魏源沿波继起，辑《清经世文编》成。它标志着顾炎武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颜元等清初诸学术大师学以经世的传统，又为时代召唤到历史舞台。总结百余年来《日知录》的研究成果，恢复其淹没已久的经世思想，已成为一个时代的课题。而完成这一历史任务的，既非一时朝廷显贵，亦非学术界名流，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学者黄汝成。

黄汝成，字庸玉，号潜夫，江苏嘉定（今属上海市）人。生于嘉庆四年（1799年），卒于道光十七年（1837年）。他生在乾嘉著名

考据大师钱大昕故里，其嗣父黄钟，即为大昕弟子。生父黄铨，也以善诗文而著称一方。汝成少承家学，又兄事大昕再传弟子毛岳生，颇得乡里前辈为学端绪。自十三、四岁起，即已“熟习文史”（毛岳生：《休复居文集》卷五，《黄潜夫墓志铭》），“博涉能文”（李兆洛：《养一斋续集》卷五，《黄潜夫家传》）。二十岁以后，成为县学廪膳生。后因久困场屋，不得入仕，遂肆力经史，博及天文历法、田赋河漕、职官选举、盐务钱法等，综贯浩博，达于精邃”（同上）。其所最为服膺者，则是顾炎武的《日知录》。正如他在写给当时江南著名学者李兆洛的信中所述：“自少至今，尤好顾氏《日知录》一书”（《袖海楼文录》卷三，《答李先生申耆书》）。

《日知录》之所以令黄汝成倾倒，并不在于文辞的博辩，考据的精详，在他看来，乃是因为“其书于经术文史、渊微治忽，以及兵刑、赋税、田亩、职官、选举、钱币、盐铁、权量、河渠、漕运，与他事物繁赜者，皆具体要”（同上），是一部“资治之书”（同上书卷二，《日知录集释序》）。因此，在毛岳生的辅导之下，他长期致力于《日知录》研究，“钻研是书，屡易寒暑”（同上）。以阎若璩、沈彤、杨宁、钱大昕四家校本为主要依据，博采诸家疏说，对康熙三十四年潘耒刻本逐卷校释，终成《日知录集释》三十二卷，于道光十四年五月刊行。书成之后，他又觅得《日知录》原写本，经与潘刻本详加比勘，辨其异同，正其疑似，共得七百余条，成《日知录刊误》二卷，于道光十五年二月刊行。之后，汝成再得嘉兴陆筠精校本，取与先前所纂《集释》校订，成《日知录续刊误》二卷，于道光十六年九月刊行。

黄汝成家素富厚，不惟刻书费用率由己出，而且还捐资选授安徽泗州训导，但因其生母、嗣父相继去世，因而居丧在家，未能赴任。他秉性旷达，乐于周济友朋困乏，深得远近学者敬重。无奈身体过于肥胖，长期为喘症所苦，后竟因此而遽然去世，卒年仅三十九岁。黄汝成正当有为之年而被病魔夺去生命，使他众



多的生前友好至为悲痛，毛岳生、李兆洛、蒋彤、葛其仁等，纷纷撰文以资纪念。其生父哀其赍志而歿，遂委托毛岳生主持，对其遗文杂著加以搜集整理，题名《袖海楼杂著》，于道光十八年九月结集刊行。其中包括《袖海楼文录》六卷，《古今岁实考校补》一卷，《古今朔实考校补》一卷，《日知录刊误合刻》四卷。汝成生前，在完成《日知录集释》并《刊误》之后，原拟续纂《春秋外传正义》，终因猝然病歿而成未竟之业，仅于《文录》中留下数篇札记而已。

## (五)

黄汝成的《日知录集释》，以及相继完成的《日知录刊误》、《续刊误》，荟萃前人的研究所得，既阐发了原著精义，校订了著者疏失，也纠正了潘刻本的若干舛错。同时，还一扫乾嘉考据学家的偏见，重申了本书经世致用的撰述宗旨，从而为《日知录》研究提供了一个最为完善的本子。因此，黄汝成以《集释》一书，使他生前以“论纂自表见于后世”（同上书卷三，《与吴淳伯书》）的夙愿得以实现。

本来，黄汝成既然为《日知录》的研究付出了长期的艰苦劳动，人们予他以肯定的评价和纪念，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。但是到清末，却有人对此提出非难，断言《日知录集释》非出黄汝成手，纂辑者应当是李兆洛。此说肇始于光绪间吴县藏书家朱记荣，他在《国朝未刊遗书志略跋》中，率先提出了黄汝成窃李兆洛书稿为已有的见解。宣统初，学者李详与之倡和，认为《日知录集释》系李兆洛与吴育、毛岳生等人共撰，“借刻于黄氏”（《愧生丛录》卷二，《李申耆先生年谱》条）。对朱、李之说，尔后的《日知录》研究者虽多不以为然，但它毕竟以一家之言而存在于学术界，且未予以否定。尤其是迄今评介清代文献的一些有影